

巍巍光岳楼,六百五十载

□冬华

为军事防御而建

“东昌为古东郡,水有黄河故道。九河虽荒没,犹可辨识。”历史上,聊城经历过三次迁城,其中第三次迁城是因为黄河水灾。选在现今位置后,为了防止水患的发生,东昌府城在建造时,整体比外高出了两米左右。护城河也因为建城取土逐渐变宽,形成环城的东昌湖。

元至元二十六年(1289年),寿张县令韩仲辉和太史令边源提出,如果从安山(今梁山县安山西南)到临清沿岸开挖运河,不仅有利于货物运输,而且能减轻民众的负担和劳苦。根据他们的建议,修建了一段长达250公里的漕河,起于安山,途经阳谷、聊城,终到临清。这条运河的开挖,使得货物可由水路直通京城,元世祖亲自将其命名为“会通河”。运河开通后,聊城一跃成为鲁西地区的军事、经济、政治、文化中心。

光岳楼最初名为“余木楼”,清嘉庆《东昌府志》提及:“楼在城中央,洪武七年东昌卫指挥佥事陈镛以修城余木建,以瞭敌望远。”由此可知,光岳楼建于东昌府城营造之初,功能是为了军事防御,因此此楼有鼓声报时,人们也称之为“鼓楼”。

明成化二十二年(1486年),知府杨能在维修该楼时,因地而名,称之为“东昌楼”。明弘治九年(1496年),吏部考工员外郎李贊过东昌,访太守金天锡,共登此楼,对该楼赞叹不已:“因叹斯楼,天下所无。虽黄鹤、岳阳亦当望拜。乃今百年矣,尚莫落无名称,不亦屈乎?因与天锡评命之曰‘光岳楼’,取其近鲁有光于岱岳也。”此后,历代重修碑记中,一直沿用“光岳楼”之名。

光岳楼雄伟气魄、巍峨壮丽,古往今来吸引了许多帝王将相、文人墨客登楼抒怀。清朝乾隆皇帝十一次东巡、南巡,其中九次过聊城,六次登上光岳楼。据清乾隆《南巡盛典》记载,光岳楼还是乾隆皇帝南巡三十六行宫之一,楼上悬挂的“神光钟瑛”匾额系清朝康熙皇帝所题。当地百姓对光岳楼也很有感情,每逢重阳节、新春佳节,城乡人民便扶老携幼登临这座“盖在半空里”的楼阁。科举时代,本地凡中了秀才、举人、进士、状元的人,更是要登上光岳楼告祭“文昌帝君”。

1974年,为纪念光岳楼建造600年,海内外名流纷纷题字作画致贺。郭沫若题写“光岳楼”匾额,现悬挂于二楼北向檐下。书画家丰子恺撰书楹联云:“光前垂后劳动人民智慧无极,岳峻楼高强大祖国文物永昌。”园林建筑专家陈从周来聊城考察时,亲笔绘画迎客松,并题下“泰岱松不老,光岳日常明”的诗句。

有关光岳楼的建造年份,现有资料几乎都显示为明洪武七年(1374年)。不过,查阅史料可以发现,清乾隆四十二年(1777年)之前的文献均未提及具体建造时间。明万历《北河纪》中称“光岳楼在府城中央,创始莫考”,明万历《东

光岳楼位于聊城东昌古城中心位置,始建于明洪武七年(1374年),是全国现存古代建筑中最古老、最雄伟的木结构楼阁之一,享有“虽黄鹤、岳阳亦当望拜”之誉。与现存的北京鼓楼、西安钟楼相比较,无论是建造时间,还是规模、形制、建筑结构,光岳楼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今年恰逢光岳楼建造650周年,回顾其营建、修缮、研究历史很有必要。



昌府志》也说“府光岳楼,在府城中,创始莫考”,清顺治十八年(1661年)的《东郡光岳楼壁记》只是提及“建之洪武之初”。而后,清康熙《山东通志》、雍正《古今图书集成·东昌府古迹考》、乾隆《山东通志》的记载均为“创始莫考”。直到乾隆《东昌府志》,才有“洪武七年东昌卫指挥陈镛以修城余木建”的说法。此后,历代均沿袭“陈镛建于明洪武七年”之说。

由墩台碑刻题记及陈镛生平事迹可知,明初陈镛组织的营建活动从明洪武五年(1372年)开始,到洪武十七年(1384年)之前结束。根据碳十四测年结果,光岳楼早期构件采伐年代分布在元初至明永乐十八年(1420年)之间,基本能印证相关记载。

营造学社曾调查

如今的光岳楼,外面为四重歇山十字脊过街式楼阁。整座楼由墩台和主楼两部分组成,墩台为砖石砌成的正四棱台,高9米,墩台四面各辟半圆拱门,门内为宽阔的楼洞,可通行车马。各门上分别有石刻匾额一方:东曰:“太平”,西曰“兴礼”,南曰“文明”,北曰“武定”。4层主楼筑于墩台上,高24米。光岳楼通高和底边长都是33米,也就是古代九丈九尺。在中国古代,“九”是阳数之极,寓意其高度不可超越。

光岳楼采用主体结构与附加结构相结合的形式,内以32根通天直上的内外槽柱构成楼的主体,外以一楼围廊和二楼平座构成楼的保护层。外层结构虽易损坏,但也易维修更换。因此,围廊和平座虽已重修多次,而主体结构却一直未动过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光岳楼的细部体现出宋元风格,比如砖台、重檐、十字脊内部置空井等,就是沿袭了宋元楼阁遗制;再如柱础,明



乾隆行宫。

洪武初年所建南京宫殿已开始用古镜式,而光岳楼仍采用宋元以来的覆盆式;另外,外檐拱科相连、梁柱相交,枋木相穿,结构紧凑而疏密得体,这也多是宋元时期的做法。可以说,光岳楼具有很高的建筑史研究价值。

1936年,营造学社成员梁思成、林徽因、刘敦桢在山东考察古建筑时虽未到聊城,但曾于同年派刘致平和莫宗江在聊城探查并拍照。可惜由于抗战爆发,营造学社内迁四川,光岳楼的考察研究被搁置起来。

对光岳楼真正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。建筑史学家路秉杰出生于聊城,从小接触光岳楼,他在同济大学读研期间,于1964年夏秋时节,组织人员对光岳楼进行了测绘调查。1978年12月,基于测绘数据,陈从周、路秉杰发表《聊城光岳楼》一文。1980年,路秉杰借前往日本留学的机会,携文稿与日本同行交流讨论。

这篇文章根据现存碑刻铭文及部分史料,初步梳理了光岳楼的修缮沿革、命名经过;其后简单

分析墩台、敞轩的尺寸及构造;最后文章按照分层的顺序,重点介绍光岳楼主楼的特征,提出主楼四层“大概是清帝南巡时仓促所建”等观点。此次调查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测绘数据,对当时光岳楼的面貌有直观明确的记录。

三十多年后,同济大学再次组织人员对光岳楼进行测绘调查,并利用碑刻、文献,进一步研究其建造背景及修缮沿革历史。团队在翔实的实测记录基础上,结合大量相关案例,利用对比法和作图法,重点分析光岳楼的构成特点,包括尺度、空间、构架、立面构成,并就光岳楼的暗层、空井等核心问题进行讨论。同时,还对光岳楼的时代和地域特征、文化结构、力学结构进行了分析。

2016年,聊城市光岳楼管理处与天津大学联合启动了“光岳楼测绘、监测及出版资料服务项目”。此次测绘采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,进行精细化现状测绘,让今人更加详细了解了光岳楼的内部情况。

五十年一大修

光岳楼能历经650年的风雨而保存下来,除了其建筑技艺精湛外,也是数代人悉心保护和维护的结果。据史料、历代碑刻和《聊城县志》《东昌县志》记载,历史上每隔50年左右,这座楼都会有一次大的修缮,仅在明、清、20世纪上半叶,光岳楼就进行过11次维修。新中国成立后,对光岳楼的保护十分重视,已进行十余次维修,其中两次规模较大。

第一次是在1984年5月至1985年12月,对光岳楼主楼进行了全面维修。因实施了“落架维修”,无论是工期还是修缮范围,都算得上是比较大的一次。维修的主要部位,一是揭盖翻修了全部瓦顶,更新了全部连檐瓦口,更换了全部望板和部分檐椽,重新制作安装了透花铁葫芦宝顶;二是更换、贴补、矫正了第一、二层廊柱和第四层八根辅助圆柱,加固了第二层东北、东南、西南角檐柱,用化学高分子灌注了上端中空的四层四根金柱,更换了部分梁檩桁枋,修补更换了大部分斗拱,更新了第二、三层部分地板,修理了全部门窗;三是对全楼进行了油饰;四是按原样重新制作了五块匾额,重新竖立和接补了五通石碑。此次维修是遵循“保持现状,恢复原状”的原则,以尽量不动原件为前提进行。

第二次是在1992年3月至1993年10月,重点是对光岳楼的基座、墩台和墙面等处进行修缮和加固修复。光岳楼基座曾于1967年进行过加固维修,但当时采取的做法是在砖砌基座外墙及平台表面抹了一层水泥皮。这种工艺虽对基座起到了一定的维护作用,但严重影响了该楼的整体风貌,加之二十多年的风雨剥蚀,水泥皮已出现严重的裂缝、脱落、渗水现象。为此,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并拨专款,对基座进行了全面维修。首先铲除了基座外表的水泥皮,然后对墙体损坏部分进行了挖补,最后用大青砖对外墙进行了包砌,用方砖对平台进行了铺墁。工毕,光岳楼基座又恢复了初建的原貌。

最近一次大修是2010年。此时由于风雨侵蚀,光岳楼的外部油漆剥落,墙面有所破损。2009年,聊城光岳楼管理处委托山东省文物保护中心制订了《光岳楼维修保护方案》。同年9月16日,国家文物局批准了山东省文物保护中心设计的方案。2010年5月20日,光岳楼维修工程正式开工。

这次维修的重点部位是光岳楼的外部木构架重新涂漆上色,四层外檐瓦面、墩台发券和墙面上的残损砖瓦更换成新的砖瓦。为了保证工程质量,光岳楼在修缮施工中,对于四层外檐瓦面进行了维修,采用的檐瓦全部来自曲阜的传统工坊。除此之外,与楼体有关的斗拱、楼门着色等都是经过专业人士的调配后,由熟悉施工工序的工人完成的,以一处楼门的重新上色为例,仅施工就需要八至十道工序,从而呈现出最佳的外观效果。

(本文作者为文史研究者)